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所三年度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张俊才等 / 著

现代中国文学的

民族性建构

建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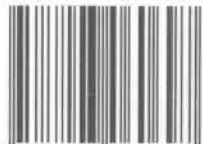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 阎卫斌
徐兴梅
助理编辑 / 魏美荣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俱往矣
民族文学的骄傲

在20世纪中西文化大碰撞之后
在地球村的今天
中国文学
能给历史留下什么

ISBN 978-7-203-06069-7



9 787203 060697 >

定价：28.00元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俱往矣
民族文学的骄傲

在20世纪中西文化大碰撞之后
在地球村的今天
中国文学
能给历史留下什么

现代中国文学的 民族性建构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2006年度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张俊才等 /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张俊才等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203-06069-7

I. 现… II. 张…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0597 号

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

著 者: 张俊才等

责任编辑: 阎卫斌 徐兴梅

助理责编: 魏美荣

装帧设计: 赵 源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235 (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晋中市万嘉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42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069-7

定 价: 28.00 元

序一

田本相

俊才同志嘱我为其主持撰写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写序，作为他的老校友，我是义不容辞的。那就谈谈我的读后感想吧！

我十分感慨的是，俊才在这样一个许多人都轻薄学术，甚至是嗜钱逐利的社会氛围中，竟然能如此坚守学术的岗位。看到他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出版，我感到实在难能可贵，实在令人佩服。比如在近代文学研究上，他撰著的《林纾研究资料》、《林纾评传》、《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导》等，当年就得到过学界的好评，其中的《林纾评传》至今恐怕还是林纾研究界的一流成果；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叩问现代的消息》、《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论》等，则说明他在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上，依然是成就突出的。

我曾在天津读书，当年的天津又是河北省的省会，因此，我对河北的高等教育还是比较了解的。坦率地说，由于“文化大革命”中行政区划的调整和极“左”思潮对河北的破坏，河北省的大学曾经备受摧残。一些学者不愿意到石家庄或保定去。但是，他却始终坚守在“庄”（他所在的学校位于石家庄）里，默默耕耘，这也是我所佩服的。

其实，我觉得似乎他不在京津这样的大城市，反而有了他贴近民情，贴近中国实际的独到的思考空间和视界。像他这本专著，就是这样一部“得‘庄’独厚”的产儿。他在“庄”里，使他在学术上更具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具有一种更强的抗力和耐性。从他的著作里，我感受到“庄”里人透露着一种中国文人的骨气，一种沉实厚重的学术追求。对于当今的一些时尚“学者”、摩登

文人来说,我以为他们是绝对不会来从事文学的“民族性”研究的,更不会用什么“民族性的视野”来观察事物,特别是观察现代中国文学。我能理解俊才同志的学术心境,如同他在本书前言中所说的: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在由旧向新的嬗变——现在更“科班”的说法是“实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西方现代文化(文学)的影响。由此,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和相应的价值取向:凡是学步西方的,就意味着开放、新潮、先进、前沿,一句话,意味着水平高、价值高;凡是属意、发扬传统的,就意味着封闭、保守、落后、普通,一句话,意味着水平低、价值低。特别是从1985年那个所谓的文学批评“方法年”开始,西方各种各样的文化(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便如大海涨潮般地一波接着一波地登陆中国,先是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走俏一时,接着是包括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接受美学、心理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等在内的“本体批评方法”在中国“众声喧哗”,再往后就是存在主义诗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福柯后结构主义、德里达解构理论、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后来居上,在中国轮番上演。

不能说这样的引进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毫无帮助,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一种偏激的、非理性的学术风气影响下,在某些“学者”那里,所谓的学术专长其实不过是能生搬硬套种种西方理论而已。于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些论文,作者好像不是在研究中国文学,而是挥舞着形形色色外国文艺理论的旗帜在中国文学研究这个阵地上驰骋,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像有一阵喧嚣一时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就仿佛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似的,但现在回头看看,却好像是当时连现代性这种话语还没有搞得太清楚,就大“抡”一番。

也许我所知甚少,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士中,最早得到“现代性”这种话语的启示,是从李欧梵先生那里来的。而李先生是从美国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那里受到启发的。如今有了中文译本(顾爱彬、李瑞华译,收入周宪、许钧主编《现代性研究译丛》)。当时,可以说是“二道”引

进,自然就吃不准,以至于要闹笑话了。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了西方关于现代性的一大套理论,其中只是翻译过来的,已经是相当多的了。结果却是你说你的现代性,他说他的现代性,看来颇有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架势。这样的理论,也的确令人望而生畏了。其实,追问起来,这些西方人在西方语境下写的东西,究竟又同中国的实际有多少关联?究竟对我们又有多少价值?正如那一阵子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折腾起来,言说者也似乎一个个得了真经似的,但也终于因为这种理论不大适合国情,而销声匿迹了。我绝不是说不应该翻译、介绍、研究、借鉴西方的文艺理论,但是,拿来硬套是套不进去的,拿来吓人也是吓不住人的。就拿我所了解的戏剧界来说吧,号称大师级的人物,把台湾大学生玩腻了的所谓后现代“拼贴”术,也当做“独创”拿出来,这都是笑话!

学界这种不好的风气,必须有人站出来予以抵制和批评。否则它会谬种流传,祸及将来,事实上它已传染到一些年轻学子身上了。近年来也看到不少博士、硕士论文,我深感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弊端。有的论文,你几乎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一篇研究当代著名作家的博士论文,洋洋十万言,读后,竟然让你不晓得这个作家有何独创之处,有何独到贡献,你看到的只是一篇用西方理论词语编织起来的“天书”。因此,我很赞成俊才在《前言》中对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不好学风的批评和思考。基于这样一点,我认为这部著作的首要价值,就是他选择了这样一个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的题目来研究。

在这部著作的“理论言说”部分,作者们对于什么是文学的民族性、全球化同民族性的关系、文学世界性与民族性之关系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的讨论。我以为它最大的理论优点,不是把这些似乎对立的关系加以绝对化片面化,而是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它们的同构性。譬如世界性和民族性的问题,鲁迅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①鲁迅的这一观点,常被人们概括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于是有人便反其道而论之曰: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而本书,却揭示它们之间的深刻的辩证关系。这些,对于一度混乱了的言说,是可以起到澄清和辨析作用的。

此外,我比较赞赏的,是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一向加以批判的“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及“战国策派的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清理再审视。

^① 鲁迅:《致陈烟桥》,《鲁迅全集》第12卷第3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也许有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我看确实是有意义的。我们常说“重写文学史”,如果像他们这样深入到历史的实际中去,从历史出发,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或者给以再评价,那么重写文学史当然是必要的。我不赞成那种不去做艰苦的资料收集,不愿做艰苦的调查研究,就在那里单靠“理论”来翻新式的“重写”。那样的“重写”是靠不住的。譬如在一些大讲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著作中,竟然把布莱希特作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源,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布莱希特戏剧的引进并产生影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甚至可以说是新时期。上述说法显然是连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就大谈其主张,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的和历史的价值。我觉得之所以我们的文学史需要“重写”,是因为人云亦云的东西太多,特别是由于狭隘的政治的党派的实用主义的历史观,遮蔽了诸多历史的真实面貌。恕我没有记得这位清华大学教授的名字,我是在一次偶然听广播中,听他说到一种“探照灯理论”。他说,探照灯照过去,是一道光束,光束之外是一片黑暗。这犹如观察事物,如果是探照灯似的,只能照到光束所及的东西,其他就“视而不见”了(大意如此)。这样一种说法,对我很有启示。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就严重存在着“探照灯”现象。我们必须看到探照灯以外的被遮蔽的史实。联系本书对战国策派的民族文学主张,对闻一多的诗论和闻一多诗歌民族性建构的探讨,我联想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剧运动”,为什么这些留学归来的学者,反而发出了这样强烈的关于文学民族性的呼唤和倡导?这应该也是以往文学史写作中被某种类型的“探照灯”遮蔽了的一种现象,因而也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现代中国文学的重大文学现象。

在这部著作的“文本评析”部分,作者们对鲁迅、闻一多、凌叔华、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 7 位作家,京派小说、现代派诗歌两个文学流派和解放区文学、新时期文学在民族性建构方面的特点、成就进行了认真的评析。尽管研究的对象中小说家占了更多的比重,但也涉及了诗歌、话剧等门类,诗歌中又分别论及新格律诗和现代诗两大种类,因此,全书实际上是以抽样的方式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进行的较为全面的研究。在作者们选作样本进行研究的对象中,有的作家如鲁迅、老舍、曹禺、沈从文,还有解放区文学等,因为已被学者们从方方面面进行过研究,要写出新意实在是很难了。但是,由于作者们在进入这一课题研究之前,都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的民族性建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有过深入的研讨(成果就是本书的“理论言说”部分),因此,即使是对这些作家的研究也能写出新意。例如,在

鲁迅创作研究中,作者把鲁迅以“立人”为宗旨的启蒙主义文学观纳入鲁迅的民族主义意识中进行论述,这就凸显了鲁迅作为“民族魂”的文化人格;再如,在老舍研究中,作者不仅论述老舍小说的民族性,而且论述老舍小说民族性的现代纬度;在曹禺研究中,作者从中国文化意味、中国人物形象、中国戏剧神韵三个角度切入曹禺话剧民族性的论述,也较之过去那种单一的从“批判地继承遗产”的角度的论述,显得更为深入。至于沈从文,作者集中探讨了其对“中原化语境下少数民族聚居区文学的民族性建构”的建树,也令人耳目一新。至于以往研究较少的作家和流派,作者们的论述更是多有创见,如对京派小说中的“童”化人物、“人”化景物、“灵”化家园的论述,对凌叔华小说中精巧的“画体结构”的论述等,都有着作者独到的见解。从全书的结构看,“文本评析”这一部分不仅对各研究对象在民族性建构方面的特点、成就有着较为深入的论述,而且与上篇“理论言说”中的基本观点相互照应,使全书虽然分为上下两篇,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当然,如同任何著作都难以尽善尽美一样,俊才主持撰写的这部著作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上篇的“理论言说”没有涉及当代文学发展中提出的一些理论话题,实际上即使是“十七年文学”期间,也有许多观点是需要辨析的。下篇“文本评析”中,由解放区走入新中国并一直活跃到新时期的孙犁、“十七年文学”期间的梁斌、新时期文学中的陈忠实等,都有作为个案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此外,“文本评析”中的个别文章,论述的角度、方法过于一致,因此文章的思路略显单一。我想,既然这部书中不少篇章都是根据硕士论文改写的,俊才同志还可以继续指导一些研究生对上述个案进行专门研究,以期有更全面的收获。

总之,尽管还有一些不足,但我认为,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专著,是一部在一个新的语境中重新提出老课题却有了新见解的专著,也是一部能够引发同行思考的专著。

2007年12月22日
于北京东郊罗马嘉园

序二

崔志远

我与俊才先生共事多年，窃以为相知颇深，尊其为张公。张公为人，均朴实勤奋；教学科研，亦多有收获。故获多种荣誉称号：教育部曾宪梓奖、政府特殊津贴、河北省省管专家、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高校教学名师等。耳顺之年，又焕发学术青春，撰文，著书，搞课题，仅在2007年便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论》、《林纾评传》(修订本)两部专著，年末，一部厚厚的书稿《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又悄然竣工。

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与生俱来，而且伴随现代文学的发展，争论至今不断。20世纪90年代，当人们在80年代“西学热”中，领略了种种新潮理论和文学样态之后，以国学热为标志的民族性问题，在炒得沸沸扬扬的“全球化”语境中重又提出。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思潮。它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西方学者骇人听闻地描绘着全球化导致的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的终结和民族国家权力的式微：“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德里达《明信片》）国内也不乏应声者：“现代化，我们的时代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正在统一世界。这个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没有历史和记忆的世界。在未来可能除了语言和人种还会有所不同外，这个世界恐怕只是一张统一规格的图纸，像今日世界各国的飞机场那样。语言也面临着被英语化的危险，英语已经掌握了世

界的网络。”(于坚《诗人及其命运》)不久,人们便发现,以经济为核心的全球化,在经济上标榜市场调节的背后隐藏的是美国和欧洲跨国资本的世界性霸权,在文化上是将欧美的价值标准强加给世界其他民族。这就必然引起世界各民族的警觉和反抗。弗兰西斯·福山说:“在农耕社会,民族主义根本不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在转向工业社会当中或其后,民族主义便迅速增长。人民经过经济近代化第一阶段,而在国家认同和政治自由遭到否定时,民族主义尤其激烈。”“民族主义大体是工业化及伴随它而来的民主与平等意识形态的产物。”^①正因如此,“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在印度,普遍的趋势是拒绝西方的形式和价值观,以及使政治和社会‘印度化’。在东亚,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学说,政治和知识界领袖都正在谈论起国家的‘亚洲化’。”^②可见,全球化热潮非但不能化掉一切,反而会激起强烈的本土、民族和地域意识,从而形成全球化和本土化、现代性和民族性、一体化与多元化矛盾共生的复杂局面。

《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以下简称《民族性建构》)的研究正是在上述语境中展开的。在这种语境下,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拒绝全球化,更不可以泯灭民族性;它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发展民族性,在民族性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这就要寻找民族性和现代性的交结点,这是一个沟通、生长点,现代化要在这里生长,民族传统要在这里重铸。《民族性建构》苦苦寻求和把握着这一“交结点”。著者认为,“在文学范畴中,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不是历时的、对抗的,而是共时的、同构的。”比如,《红楼梦》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世界性在于它们都张扬了“人”的生命的自由状态,都抒写了“人类”共有的普遍的瞬间的永恒,都最终定格为一首生命与爱的赞歌;其民族性在于“前者是一曲哀婉缠绵的带着中国情趣的爱情悲歌,后者则有着德意志民族特有的为爱不惜焚烧自身的剧烈和具有宗教意味的忧悒”。正是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共时性思考中,著者把文学民族性的核心和灵魂界定为“民族精神”,即“中华民族奋发图强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情感、生活和斗争”。具体分为两个方面:(1)在人们的无意识中积淀而形成的审美趣味、审

①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第306—307页,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②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91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出版。

美观念和审美方式,包括以诗歌和散文为代表的抒情传统和以小说、戏剧为代表的写实传统;(2)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所塑造的处世哲学和人格理想,包括“明道济世”的政治关怀,“宁鸣而死”的批判意识和“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大胆而深刻的判断。其大胆在于摆脱了文学时俗——形式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的影响,将民族性的核心定格在包括生命意识和道德意识的“民族精神”上(艺术形式的民族性倒在其次);其深刻在于认为民族精神是一种“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精神,既与民族传统联系,又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随历史发展。正如别林斯基所说:“要使文学表现自己民族的意识,表现它的精神生活,必须使文学和民族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能有助于说明那个历史。”^①将民族性视为不断随历史发展的概念,不仅因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不断吸收外来文学的营养丰富自己的肌体,这就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将民族性和现代性对立起来的偏见,似乎民族性就是旧的传统,现代性就是新潮和现代。其实,二者不仅矛盾和对立,而且能转化和交融:现代性在民族性中生长,民族性在现代性中更新。基于此,本书不仅将全球化视为对民族性的挑战,而且视为民族性发展的契机。这样的民族精神,正是全球化与民族化的交结点。

本书的视野极其开阔,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数千年的文学传统、世界文学发展格局、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国的社会风貌……可谓思接千载,心游万仞。细思之,本书运用的是一种“历史合力论”分析法。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提出“历史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能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了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恩格斯讲的是历史,文学的历史自然也可以作如是观。如果把这种思想稍加发挥,可以把力的平行四边形分出不同的层次:众多小的四边形的合力组成较大的四边形,较大的四边形的合力组成更大的四边形……最终由少数重大四边形的合力构成文学史的综合力。如此,在思考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的时候,则要寻找巨大的平行四边形的重大

^① 别林斯基:《“文学”一词的概括的意义》,《别林斯基论文学》第77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

合力。《民族性建构》在论述中至少抓取如下合力：民族文学传统、世界文学格局、世界全球化语境、中国现代化进程等。正是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制约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生发出一个个文学思潮。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正是在各种合力的交互作用中生成与发展。正如本书中所说，它与民族文学传统密切相关，一个作家，“不论他的创作多么真实，多么富有新的特色，它也不能不受到‘往昔之井’的‘遥控’，它也不能不是‘某些已有的形式’或‘神话模式’的‘复活’与‘再生’”；它难以摆脱世界文学的影响，因为，“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制约、消化已成为一种客观的潮流，在这种交流和对话中，各民族、国家和地域的文学在学习和借鉴中，势必会自然地整合、吸纳各种人类共同认可和确认的优秀的文学理想和审美趣味，以及最适合表达这些共有内质的形式和方法”；它又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当今这一全球化语境下，随着人类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愈来愈近……不同民族、地域、国家、种族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正是在这种综合性思考中，著者得出文学的民族性必然要随着民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结论。

《民族性建构》的综合性思考，还在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与印证。著者首先以三章的篇幅对文学的民族性进行理论界定，然后以此为依据，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些理论思潮诸如闻一多诗论、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战国策派的民族文学运动、20世纪40年代民族形式讨论进行了考察和评析，同时对重要作家作品和创作现象诸如鲁迅创作、闻一多新诗、凌叔华、老舍、张爱玲及京派小说、曹禺话剧、现代派诗歌、解放区及新时期文学进行研究和评判。这是一项宏大的综合工程：对民族性问题做出富有个性化的理论界定固然不易，用这种理论阐释和评判百年来各种重大的理论和创作现象，从而验证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判断，也颇多难处。可贵的是，本书较好地完成了这一整合。

《民族性建构》值得称道的，还有“课题引领、教学相长”的写作方式。在研究生的教育和教学中，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是重中之重。提高的最佳途径则是令其“强学力行”（韩愈语），从事研究实践。我也曾让研究生参与自己的课题，但只是吸收少量人员。俊才先生却是“放手发动群众”，将课题研究作为教学内容，让学生广泛参与，使自己的思考变为学生的实践，相互切磋，教学相长，最后优中选优，形成课题的最终成果。这需要有高屋建瓴的指导能力和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可喜的是，俊才先生有之。

本书也有一些值得推敲的问题,比如,将民族性的精魂界定为民族精神固然颇有见地,但有两个问题需进一步辨析,一是对民族精神的负面因素如何认识,它与所认定的正面精神关系如何?因为,从鲁迅揭露国民性弱点到胡风提出“医治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再到高晓声揭露的农民的主奴根性,一直是现当代文学言说的深刻话题。二是艺术形式的民族性虽非核心和精魂,但有否与民族精神相联系的稳定形式,这些形式对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作用如何?也有待进一步思考。再者,由于本书是多人写作,难免水平不一;个别章节也稍显粗疏,民族性的理论思考未得到很好贯彻。

上述评说纯是班门弄斧,是也非也,张公明鉴。

2008年元旦于河北师大寓所宁远斋

前言

本书是我在 2006 年申报的一个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的结项成果。其实,早在 2004 年我就以大致相同的内容向河北省教育厅申请过立项,只不过由于支持的经费不足,因此,我除了进行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准备,并撰写了几篇相关的论文外,拟议中的研究计划便只好“泡汤”了。

但这个课题却对我有着持久的吸引力。之所以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我承认其中受到过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启示。但也仅仅是启示而已,坦白地说,我至今连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和佳娅特丽·C.斯皮瓦克的《属下能说话吗?》、《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都未认真读过。我之所以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更主要的原因是源于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即本书所谓“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感受。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在由旧向新的嬗变——现在更“科班”的说法是“实现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西方现代文化(文学)的影响。由此,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和相应的价值取向:凡是学步西方的,就意味着开放、新潮、先进、前沿,一句话,意味着水平高、价值高;凡是属意、发扬传统的,就意味着封闭、保守、落后、普通,一句话,意味着水平低、价值低。特别是从 1985 年那个所谓的文学批评“方法年”开始,西方各种各样的文化(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便如大海涨潮般地一波接着一波地登陆中国,先是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走俏一时,接着是包括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述学、接受美学、心理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等在内的“本体批评方法”在中国“众声喧哗”,再往后就是存在主义诗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福柯后结构主义、德里达解构理论、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后来居上,在中国轮番上演。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作家、

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不应该对上述“西学”熟视无睹，可以设想，假如我们的作家、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真的对上述“西学”熟视无睹，那么中国今日的文坛将是怎样的萧瑟和单调啊！假如我们的作家、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真的对上述“西学”熟视无睹，那么中国今日的文学又将如何秉有“现代”的品格并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呢？但问题是，在上述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的左右下，在一个不算太短的时期里，我们的创作界、理论界、批评界的主流话语，却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把图解、套用、操练上述“西学”视为思想解放、观念先进。这种风气也影响了大学校园，比如包括我们河北师大在内的许多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中，不少有点才气的学生每到做学位论文时，最喜欢研究的作家就是那类以追步西方为创新之道的“先锋”作家，最喜欢运用的研究方法就是上述五花八门的“西学”中的某一种。每当我看到当代文坛上那些新锐人物们在喋喋不休地“言必称西人”并且颇有些以此沾沾自喜时，每当我看到有些学生是那样虔诚地把自己的才华和精力都耗费在对某些“先锋”文本中的欲望、性、死亡、荒诞、虚无意识和种种已被按照“西学”术语重新予以解读的结构模式、叙事技巧乃至“圈套”的论述和赞扬中时，我的心中便涌起一种莫名的疑虑：难道我们中国文学的未来就是这种先锋文学么？这种先锋文学从意识到技巧不就是对西方某种文本并不高明的模仿或“复制”么？难道我们中国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就命定是只能做西方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法的操练者或贩卖者么？我们的古人曾创造过辉煌的“唐诗宋词汉文章”，就连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元代和清代，也创造了震撼千古的“元曲”和《红楼梦》。即便是在1949年以前那个动荡频仍、战乱不已的岁月里，我们的前人也涌现出了众所周知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以及沈从文、艾青、胡风、张爱玲等一批文学大家。作为后人的我们，怎么能如此没出息地只知道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地“学习”并且自我感觉良好地以所谓“先锋”自居呢？这究竟是才高八斗、勇于创新的“先锋”呢？还是根底浅薄，只能凭借上天赐予的一点小聪明在玩弄“时尚”呢？据说当代的不少作家、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仍然存在着相当浓厚的“诺贝尔奖”情结，他们常常会为这个国际性的文学大奖总是与中国无缘而愤愤不平。但我要说，倘若我们今日中国号称“先锋”的文学仍然只知道一味地模仿、复制西方的某种文本，倘若我们今日中国的文学中仍然不能产生一批具有宏阔的世界视野、丰厚的民族生活意蕴和鲜明的艺术特色的杰作，“诺贝尔奖”恐怕仍然会与我们这个曾经的“文学大国”无缘。

我本人的专业并不是文学理论甚至也不是文学评论，我深知自己在这方面先天不足。因此，尽管我自己的朋友中很有几位与创作界关系热络，但我自己除了对已成为“历史”的近现代中国文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外，却始终与当代作家、当代创作界保持着井河不犯、各行其是的态度。我无意也无力挤进当代文学的评论中去“凑热闹”，但上述疑虑却一直积存在我的心中并且愈积愈厚。我不想也不敢贸然写文章对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当代文坛“指点江山”，但我却不能对自己心中的疑虑麻木不仁。于是，从2002年开始，当完成了我与李锡龙君合作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的写作后，便带着我心中久存的疑虑，带着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写作过程中对相关问题的思索，在研究生的学位课教学中增加了一项内容：组织研究生就“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与问题”展开专题研讨。为了使这项教学活动落到实处，收到实效，我为学生搜集、编印了三个“参考资料”：其一是“民族性、文学民族性、文学民族性建构资料”；其二是“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资料”；其三是“民族性与现代性之关系资料”。这三个资料不仅对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和厘定，而且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种种不同见解。我的想法是，通过这一教学活动，一则可以把我的疑虑转变为大家的思考；二则可以为研究生教学如何突出“研究性”蹚一蹚路子；三则通过师生研讨可以使我们对一些理论问题、现实问题获得更清晰、更全面的认识。应该说，这项教学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从2002级到2006级，每届学生大约20人，都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与问题”这一总课题下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子课题进行研究，并且都要写成正式论文在全体同学面前作“学术报告”，而同学们则要相互进行“点评”。不能说学生们写的这些属于“作业”性质的论文都多么好，但每年又总有一些论文令我眼前一亮，显示出年轻学子们思想的活跃与敏锐。事实上，学生们写的这些论文后来有的公开发表了，有的则扩而充之，成了他们的硕士论文。

《礼记·学记》云：“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作为一名教师，我深知此言之不谬。因为正是通过组织学生就“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建构与问题”展开一次次的专题研讨，我渐渐对文学民族性的基本内涵、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民族性建构中的经验和教训、如何提升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等问题获得了一些较为清晰的认识，并感觉到这一问题应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受到应有的关注，于是乃有2004年向河北省教育